



基础教育语文教材语言研究丛书

主编：苏新春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基础教育 识字教学研究

Language

董兆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基础教育语文教材语言研究丛书

主编：苏新春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基础教育 识字教学研究

Language

董兆杰 ◎ 著

教材

语文



SPI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础教育识字教学研究 / 董兆杰著.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12

(基础教育语文教材语言研究丛书 / 苏新春主编)

ISBN 978-7-5548-0947-1

I. ①基… II. ①董… III. ①汉字—教学研究—小学
IV. ①G62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9621号

责任编辑: 黄倩 唐妮妮

责任技编: 涂晓东

JICHU JIAOYU SHIZI JIAOXUE YANJIU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5.25印张 275 000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947-1

定价: 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772438

总 序

苏新春

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成立十周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连续发行十年之际,我们这套“基础教育语文教材语言研究”丛书也出版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005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成立伊始,就以教育教材语言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在厦门大学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共建书中这么写道:“教育教材中的语言状况是整个社会语言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对整个民族的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乃至所有的知识教育体系,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可以对教育教材的语言现象进行实时的动态监测、分析和研究,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了解语言现象的动态变化,为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等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更积极有效地促进和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健康发展。”

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从来都是所有课程的重中之重。它伴随着每一位孩子的成长,从小学一年级的启蒙学习开始,到初中,再到高中,就是进了大学,大一仍放不下语文课。语文课如此重要,到底是哪些因素在里面起着作用,对这些因素该做怎样的离析提取,是很值得探讨的。语言文字的学习掌握,核心在语言能力的获得。人们经常会说,语文课还承担着社会知识学习、人文情怀熏陶、道德价值观养成的任务。“文以载道”“器以盈气”,后者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在语文课中,“文”与“道”“器”与“气”是怎样的关系?谁起主要作用?如何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习与成人社会的作品学习是一样的吗?如不同它们该如何呈现?再细究下去,不同年级的语文课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凡此种种,都使得中小学语文学学习变得复杂无比,褒言之则是丰富无比。原因当然是人们太看重语言文字能力的获得,太期待语文学习的良好效果,当然,也浸透着长期以来对语文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混而不清、彰而不显的失望。

当我们希望从语文教材中把教材语言离析出来，加以科学化、层次化、序列化，让它变得可分解、可量化、可统计、可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文”与“道”“器”与“气”中，前者才应是语文课最重要的内容，是语文课文最重要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也就无所谓载荷之物。而且，这个载体本身也有着“体”“用”之分。“体”就是语言文字知识，“用”就是语言文字功能。学习的关键就是如何将语言文字知识有效、迅速地转化为人的语言文字能力。当然，在学习、转化过程中，必定会受到社会政治、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的影响，可这并不意味着后者会来得更重要。只要看一个事实就清楚了，就是语文学古来有之，文字的“蒙求”，辞藻的“华达”，音韵的“抑扬顿挫”，文章的“起承转合”，从来里面都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文道文气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可具体内容却代代有变，从君君臣臣到唯民为大，再到中华梦的实现。前之恒，恒的是其文其器，其本其体；后之异，异的是其道其气，其功其用。语文课追求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素质基本能力，政治课品德课思想课追求的是时异世异、适时适世的知世治世之观。如此看来，从庞杂无比的语文课中分离出那些语言文字的知识、本体、功能，直到人的语言能力的培养与获得，至关重要。

教育教材语言研究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揭示它的性质、构成、分布及功能。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建立在教材语言数据库的量化分析上。论述了教育教材语言具有的基础性与功能性、有限性与有序性、通用性与专业性，将对教育教材语言的探求概括为五个问题：“教什么不教什么”“先教什么后教什么”“怎么教”“效果怎样”“如何评测”。在具体研究中，重点放在第一、二、四个问题上，研究成果主要刊于当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如《国内出版十二套对外汉语教材语言调查报告》（2006）、《基础教育新课标语文教材用字用词调查报告》（2007）、《基础教育新课标历史、地理教材用字用词调查报告》（2008）、《基础教育语文教材用字调查》（2009）、《海外汉语教材用字用词及语用调查》（2011）、《数理化新课标教材用字用词调查》（2012）、《大陆台湾中小学语文教材课文选文对比》（2013）、《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与人教版教材的用字用词比较》（2014）等。这些专题涉及教育教材语言的方方面面，从使用到分布、字种到字序、频次到频率、词频到义频、文本到年级，对课文从文章体裁到内容题材、时代传承到语言风格、课文的自编到选编，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用不同方法进行过探讨，得到了一批批准确的字表词表、频率表分布表。既可以依大纲俯察教材与教学，也可以从课文仰观大纲与教材。在研究材料上，以大陆教材为主体，参之台港地区，观其状，辨其变，对不同地区间的教材语言分布与

处理有了更多认知。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本丛书将对当前语文教材的研究往前作一延伸。对我国现代基础教育形成与发展百年间的语文教材语言做一通盘、纵向、流源式的考察，通流观变，其意义和结果都是令人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我们的课题进行中得知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兄弟单位分别承担了“20世纪语文课程研究”与“20世纪语文教材研究”的课题，得到国家社科等重要基金的支持。这让我有了“分兵合击”“互为犄角”的感觉。相信“合围”之下，对基础教育语文课能从大纲的设计与要求，到教材的编纂与实施，再到教材语言的分布与教学，看到其中更多互联互动的联系。

本丛书的作者主要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知识背景主要为语言学，本有专攻。郑泽芝教授专攻计算语言学，李焱副教授善于汉语史与台湾语文教材研究，赵怪怡副教授长于语义计算，罗树林博士倾力于应用语言学，他们都对教育教材语言领域观其宏、迷其奥，而决意投入这个崭新领域，分别承担了20世纪中某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作者中还有辽宁师范大学李娜博士，她从博士到博士后，一直浸润在民国时期语言演变中，现在又转人民国教材语言研究，对从定性到定量充满热情。还有天津唐山的董兆杰先生，他对汉字教学有着长期思考，将思与辨、破与立做了有力结合。

本丛书的写作，我们遵循着“一个中心、两个参照点”的原则。这个中心就是教材语言。不管在哪个时期的教材研究中，都是以教材语言为中心。要全面详细反映出教材语言中两个基本要素——汉字与词汇的构成情况。要对其教材分布、年级分布、课文分布，对其字（词）量、字（词）种、字（词）序的构成，对其共现与独用、高频与低频、常用与偶用的种种使用状况都要有详尽统计分析。可能的话还会对部分语法、语用、篇章的使用情况有所涉及。这个中心是本丛书的最大立足点。所有分析都将立足于语料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要对所分析的语言问题有量的准确呈现。由于人力时间的限制，定量分析时只选取了一两种典型教材，只有民国时期选取的教材超过了十种。所有的教材语言分析都要从“教学”的角度加以思考。因为教材语言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语料，就在于它有明显的教学功利。在基础性功能性上，有限性有序性是教材语言最为显著的特征。这当然跟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制安排、年级差异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教材中的精读课文、阅读课文、练习、测验、复习，都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存在的。其核心就是要呈现教育教材语言的构成与面貌，要体现教育教材语言的有限性与有序性，要解决教育教材语言在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与获得中所起的作用。

两个参照点中的第一个是将教材语言分析与教材内容课文内容紧密相连。所有教材语言问题的分析都要尽量跟课文内容相参照。如果做不到这点，则教材语言分析就成了纯形式的分析，跟一般的统计语言学别无二致了。另一个则是将教材语言分析与课程设计课程大纲紧密相连。具体教材总是为了体现教学大纲才存在的，教学大纲又是来源于课程的定位与设计。

作为具体问题出现的“教材语言”久已有之，作为独立研究领域出现的“教材语言”则为时尚新。这是一个尝试，它期望成功，而存在不足是必然的。另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有更多同道一起在这个领域耕耘。

2015年12月7日于厦门大学

序一

苏新春

跟董兆杰先生第一次联系是2007年。那时正在筹备“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研讨会”，董先生很早就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论文题目是《字频统计与识字教育科学化》，后因身体不好而未能到会。之后的第三届、第四届他也都送了论文，可都未成行。最有可能见面的是渤海大学那次，锦州离他家乡很近，可春上气候多变，家人不放心他出门远行。书信八年，至今未能晤面。

每次来信，他谈的都是汉字教学方面的问题。每每读到来信，我都会受到两种矛盾信息的冲击。一方面是他的身体羸弱，多病，心脏不好，视力很差。另一方面是他对汉字教学科学化的执着与使命感。谈起课题，谈起研究计划，还有那一直萦绕在心的学习性字表，他就立即会变得中气十足，思路敏锐。下面摘引几则他的来信：

苏先生：两年前，心肌梗塞病差点把我从这个世界带走。身体刚见康复，我又开始了识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本想尽早完成《分级识字量表》的研制，无奈受制于国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久久不能出笼。8月盼来了字表，读后却大失所望。……现我把文章发给您，希望在您方便的时候读一读，给我一些帮助和支持。我哪儿说错了，请不客气指出。有何补充、修正，请不吝赐教。如果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希望运用您的影响和关系，或推荐报刊采发，或在博客上转载，或向有关方面转送、推介。

(2009-11-8)

苏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在您十分忙碌的时候打搅您，请原谅！

谢谢您的盛情邀请，如果到时我的身体可以，我争取参加会议，见见您。我有许多话要和您说。……我希望你们把工作中心转向不同学习对象的识字等级量表的研制。这是汉字教育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是一项不断被提起，却

不是一个人和少数人可以单独进行的研究；是一项没有被权威部门重视，甚至是不屑一顾的科研课题；是一项有着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研究课题。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需要这样的研究成果。

我个人为此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准备，但是，不论我的能力、经验、学识、财力，以及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方面，都没有能力进行完这项研究。如果你们进行这项研究，我会把我的资料、经验全部贡献出来。我的身体不好，又年事已高，我非常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一组识字量表，结束多年来识字教育只有字量规定，没有字种、字序限制所造成的混乱和低效益局面。

(2010.1.26)

苏先生：您发来的信和邀请函均收到。谢谢！

关于小学识字等级量表的研制我已经想了好几年。……我的基本观点是：

1. 字表研制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多年来识字教育有字量规定而无字种限制的情况，已经造成了教材编写和教学的严重混乱，影响了识字教育质量的提高。你们的统计实用数据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2. 过去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其他字表已经过时，并且存在统计和研制方法方面的不足，再也不能充当课程标准。新的通用规范字表即便不流产，也不能作为小学教学的依据。研制新的字表刻不容缓。

3. 儿童识字量表的研制，必须从儿童的用字的实际需要出发；儿童识字量表的规定和字种的选择既要考虑起始学段的需要，也要考虑未来学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也就是您来信所说的：体现“基础教育用的学习性字表的性质与功能”。

4. 如果不进行儿童用字的统计，字表的研制就无法进行。儿童字表的研制若是建立在儿童用字统计的基础之上，也就不会出现您在信中提出的三点质疑。

5. 进行儿童用字统计，不能只统计儿童课外读物用字，更不能以过去和现在的语文教材为语料（因为它们的用字脱离儿童的用字实际）。儿童用字，既包括阅读（各科课文、作品，各种媒介的文本等）用字，又包括写作（作文、作业、日记等）用字。

6. 不进行大容量的、原始语料的儿童读、写用字统计，就不能确定儿童识字从哪些字开始，就不知道识字量的最低要求，字表的定量、分级、排序都无法进行。

7. 进行儿童用字统计，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的、系统的工程。我个人没有

人力、财力、学力和权力完成，但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和设计。你们有我所没有的全部条件……

您在来信中提到字表的研制要从选字范围、角度和对象三层面全面考虑，应当满足“小学生认知需要、心智成长需要和优先需要”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提交一篇论文，补充我去年论文的不足之处，提出具体设想。我会在成文后先发给您，作为我们讨论、交流的基础。

(2010.3.1)

苏教授：今天我收到了渤海大学来的《教育教材语言论集》，打开书本匆忙找到序言和我的文章之后，让我非常感动。您在2100多字的序言中，竟然用200多字的篇幅对我进行褒奖；在200页的文本中，也慷慨地给了我32页——6/10的页面，这是您和同行对我最大的支持与肯定。……

3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请转达我对夏教授的深深谢意。

我还要感谢您的博士生唐诗瑶，是她花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把四篇文章合成一体，让她受累了！

(2011.4.14)

苏教授：关于对书稿修改的事，让我很纠结。我是个在教学和学术上精益求精的人，实在是不希望我的书带着“伤病”与读者见面。但是，我现在万分无奈。

从去年12月中旬，医院的眼科专家就告诉我必须注意保护视力，否则会产生严重后果。他告诫我，不能长时间看电脑，否则，视力会更糟糕，光过敏的反应会更强烈，眼痛、流泪的毛病也会更严重。

对书稿的修改必定是一项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的事，我目前是没有条件进行的。您很忙，怎好麻烦您承担如此繁杂的工作。让别人修改，他们又不一定同意我的书中阐述的与众不同的学术观点，改不好，或者改乱了。如果是不太大的毛病，就交给编辑去处理吧；如果属于需要大修大改的毛病，能够决定书的出版与否，我也只能遗憾地放弃您给我的这一次难得的机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2015.6.16)

八年未遇的通信中，我总感觉到有一种学者的压力，在教育教材语言研究背后竟有着那么多的期待与展望。对他的研究成果，也有了一种推广的责任，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与跟进。对他的要求、困难或吩咐，也似乎有了一种自然听从的习惯，当成了义不容辞的份内事。上信提到四篇合一文的事，当时就是请我的学生诗瑶来帮助完成的。这次定稿，我做了一些代劳的工作，唯因义之难辞。

得到董先生的信任，嘱写一文。序不敢当，聊忆数事，以记其事，以观其志。

2015年12月15日于厦门大学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

序二 识字教育科学化的突破口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戴汝潜

董兆杰先生的大作终于付梓出版了，我在此不得不一反“作序”之常态，首先不谈学术成就，而要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也要向出版社的有识之士表示深深的敬意！为什么？因为董先生是汇聚在“识字教育科学化”旗帜下的一员老将，几经磨难终成正果；因为鲜有如这般慧眼识珠，明察“识字教育科学化”的书法家，是为弥足珍贵。

董兆杰先生一生从事语文教育，对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教学所面临的困惑深谙其苦，深知其害，深以为痛。即便从政、退休，他也没有放弃“苦其心志、上下求索”——试图摆脱语文教育传统教学思路的桎梏，独辟科学之蹊径，网天下之同仁知音——仅凭一个“文人”用如此现代的科学态度、思路 and 数理统计方法探究解决语文问题这一点，就是值得天下所有语文教育工作者思考、效法与尊崇的！

众矢求一的，群英辟四方！

1994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对古今中外识字教育方法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召开了首届识字教育国际研讨会，会上强调：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拦路虎”是语文教育的滞后，语文课程改革的“瓶颈”在“识字教育”，识字教育的关键在于实现“识字教育科学化”，而识字教育科学化的突破口在于“序化”理念和方法的确立。此后，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此呕心沥血，为着识字教育科学化奔走、疾呼、探索、实验至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理念、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摆脱了坐视“忧思”的慵懒集束，陆续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惊人成效，积累了一系列立足现代科学思想、吸纳现代科学方法论质的宝贵理念和经验，诸如——

只要中华民族在，识字教育就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一家独尊没有前途；

只要中华文化不舍传承，落实中文阅读就是书面语发展关键期的锁钥；

汉字可以实现快速高效识字，能够实现尽早阅读；

汉字的自身规律决定了序化汉字学习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

序化识字具有字音字形字义以及字量字种字用诸方面的科学序化依据；

序化识字的途径、方法、策略同样具有科学序化的综合优化规律可循。

“序化”是一切科学最基本、最突出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基础、最迫切的需求，中国语文教育要不要、能不能序化，是中国语文教育是否能够以科学的姿态适应科学时代的需求、实现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分水岭，是中国语文教育是否能够简捷高效地普及和传承的关节点。基于此，识字教育突破了由来已久的“语文教学自在研究”的局限性，逐步走向自觉吸纳现代信息学、脑科学、心理学、系统论、统计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科学新理念、新方法的康庄大道，发现、归纳、完善、系统、总结了对汉语、汉字、中文自身规律性的新认识，终于使序化识字的方法论体系成型，显露出中国语文教育科学序化的曙光。董兆杰先生的“字频识字”就是这个方法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意义深远，潜能无限。

近年来，众多实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反复实证其成功。从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所谓“汉语难学”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汉字自身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科学层次的研究，所谓“汉字难认”是因为没有探求到“序化识字”的科学途径和科学方法。归根到底，中国语文教育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缺失现代科学“序化”理念的结果。董兆杰先生的大作不仅仅是对识字教育科学化的贡献，也是实现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掷向中国语文教育科学序化的“敲门砖”。简言之，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只能以汉字识字教育科学序化为基础前提。为此，我们可以胸有成竹地、再次郑重地骄傲地宣示：识字教育乃至语文教育已经取得了期待已久的、科学序化层面的突破，所谓“汉语难学、汉字难认”的历史将就此终结。

谨以此是为序。

2015年冬于京城治未斋

前言

基础教育识字教学需要科学发展

语文是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是学好其他各门课程的基础。因为学生的成长与社会语言文字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非常容易凸显出来，所以，每当人们议论基础教育的质量和语文这个重要的学科时，总会列举各种表现和多种理由，持续地表达对语文教学的强烈不满。

识字教学是语文教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语文教学的起点和基础，也是决定语文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素养的关键。所以，识字教学改革始终是语文教学改革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一个领域。

没有高质量、高效率的识字教学，就不可能有语文教学的科学发展。通过识字教学的科学发展来推动新一轮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重任，已经摆在了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面前。我们只有进行广泛动员、深入研究、科学实验、综合治理，才有希望开辟一片新天地。

我们必须同心协力，进行系统的、多层次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排除各种非科学的习惯和观念的干扰，尽快构建起科学的识字教学理论、内容和方法体系，破解识字教学的困境。同时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识字兴趣，用最符合儿童需要的字种、字量与最方便、有效的方法和策略，保证小学生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取尽可能大的识字量和尽可能高的巩固率，全面提高他们的识字能力和语文素养。

一、识字教学的科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实现识字教学的科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破解识字教学始终不能走出低效率的困境，需要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系统思考。

从古至今，识字教材不知道编写了多少种，风行一时的识字教学法也说不清

发明了多少个，更数不清有多少人被称为识字教学专家。可是，识字教学效率不高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识字难学”这一问题，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横亘在人们的面前，让人望而生畏！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识字教育存在的问题是识字时间过长，识字数量不足，从而造成识字效率的低下。这里所说的识字时间长、效率低，主要是指通过小学一、二年级的学习，学生的识字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阅读和写作的基本需要，语文教学不能及时、顺利地转入以阅读和写作为重点的教学阶段，是识字教学拖累了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学习。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造成识字教学始终不能走出低效率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2

从宏观上看，是指导语文教学和识字教学实践的基础理论、基本观念和改革的方式方法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疏漏，制约着识字教学的深入改革。不能正确处理语文教学与识字教学的关系与区别，在识字教学中过分强调人文教育，忽视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基本技能的训练。

从中观上看，传统的识字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体系、课程体系，因为宏观上存在弊端的制约而不能得到根本的改造，新的识字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面临着重重困难。不科学的传统和习惯，仍然作为“主流”顽固地霸占着统治地位，束缚着改革者创新的手脚。例如，不能根据小学生的用字需要和用字顺序确定识字教学的内容，不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实际采用科学的识字教学方法，等等。

从微观上看，是人们在识字教学的内容、程序和具体方法上存在着一些模糊、错误的认识和做法，比如先学拼音后识字、先读书后识字、识字要做到“四会”，以及过分地传授字源、字理方面的知识等。这样的安排和要求，也人为制造了一个个“识字难”的误区，不断作茧自缚般地耗费着师生的精力和时间，大大降低了识字效果。

另外，识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识字教学的改革必须与整个语文教学的改革统筹考虑，协调运作。

所以，解决识字教育存在的问题是个系统工程，要全面反思，系统研究，科学实验，综合治理。

要实现识字教学的科学发展，大力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要消除百余年“识字难学”的影响；要校正五十多年“识字拼音化”的误导；要匡正用外来的语言文字学理论代替汉语识字学理论的荒谬；要戳穿以改革的名义全盘否定传统识字教学经验的诡辩；要改革用行政手段和权威

拍板取代学术争鸣和科学实验的管理、科研体制的现状；要对行政主导的教材编审、发行体制进行深刻检讨；要肃清唯利是图的商业炒作对识字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污染；要唾弃不断用玩弄概念和“翻新”识字方法盲目增加识字数量、简单加快识字速度、冒充改革的急功近利表演……

我们只有在全面反思、深刻研究和扎实实验的基础上，吸纳现代语言学、文字学、文章学、口语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对语文和汉字教学的基础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构建；继承优秀的传统经验，吸收过去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识字教学的课程内容体系进行科学重构；坚持“以人为本，以用为本、以字为本”和“为用学，用中学，学中用，学会用”的原则，对识字教学的方法、策略体系进行改革创新。

此外，还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全面提升小学语文教师的理论素质和优化教学方法。只有这样，识字教学才能够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少数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许多专家、学者、教学研究人员和广大语文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群策群力、持久奋斗。

二、识字教学科学发展的重点和要求

提高识字教学质量的根本出路在于科学化。实现科学化必须积极解决识字教学理念的创新问题，以及识字教学内容和识字教学方法的规范化问题。

1. 创新识字教学理念

语文教学，历来就是我国教育改革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我们已经在语文教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前面所列举的种种原因的存在，某些落后的教育教学理论，没有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得到矫正和创新；新的教育教学理念还没有得到普及和尊重。比如，我们一直用从西方外移植过来的“词本位”的文字学理论充当“字本位”的识字的文字学理论，并且用这样的文字学理论取代识字教育学理论。所以，至今还没有建立起独特的识字教育学的学科理论，以及相应的内容与方法体系。

把语文课程的概念简单地混同或机械地等同于“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化”“语言和人文”等，并因此曲解语文课程的性质；通过强调“人文”“文化”“文学”属性，取代“交际工具性”的根本属性；通过强化“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把语文教学搞成了人文教育，甚至把小学生的识字

课都上成了识字的字源、字理文化课。

忽视语文学科的层次性特点，没有区别不同学校、不同学段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要求，进而模糊了识字教育在小学低年级和语文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混淆了识字与阅读、写作的关系，转移了小学低段的语文教学重点，破坏了识字教学的规律，严重影响了识字教学的效率。

在语文课程性质的表述中，长期把语言文字的“交际工具性”简略为“工具性”，忽略了语言文字应用中“公用性”与“交互性”相互制约的特点，造成了识字教学内容的混乱和教学要求的偏颇。

语言研究应该以语言事实为根据，只有详尽、大量地占有语言文字材料，才有可能把握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规律。尊重语言事实，就必须承认识字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尊重语言事实，还必须承认不同的人群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无视识字在当代、现代语言文字生活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事实，否认不同人群、语境用字的差别，搞不清共用字与独有字的字种、字量关系，必然无法破解识字教学内容科学化的难题，使识字教学不能做到与时俱进。

识字的目的是为了用字。用字是检验识字教学效果的唯一标准。但是，由于受传统识字教育理念和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仍然习惯于对识字的字音、字形和字义进行文字本体认知的静态研究，忽视了对各个要素的变化、联系以及字际关系的动态研究；强调对识字应用中的本体功能、职能及其变化的评价研究，忽略了对不同字的使用效能、效度的字际比较的“字用规律”研究。字用规律研究的空缺，使识字教学的字种、字量和字序规定缺少了科学依据。

2. 规范识字教学内容

因为传统的观念、方法仍习惯地占据着“统治”地位，新的识字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面临重重困难。

比如，多年来识字教学只有识字数量的具体规定，没有字种的明确规定，更没有识字顺序（字序）方面的科学安排。因为对“常用字”的概念理解不同，又没有统一的字表规范，造成了教材的用字量总是大大超越大纲和课程标准规定的识字数量；造成了大量的非常用字挤占了本来属于常用字的“地盘”；造成了各种违反识字用字和识字科学规律的字序安排泛滥成灾。有些教材，完全颠覆了人们对“生字”这一概念的传统理解，第一次出现的、不认识的字，可以不叫“生字”，只有专家定性为生字的字，才算“生字”。

字种不清，字量超标，字序不清，生字的概念错误，这些不规范、不科学的做法，都毫无疑问地耗费了师生的时间和精力，大大减损了识字效率，使识字教